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全球化的  
許諾與失落

Joseph E. Stiglitz 著  
李明 譯

From 08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作者：史迪格利茲 (Joseph E. Stiglitz)

譯者：李明

責任編輯：孫培元

美術編輯：謝富智

法律顧問：空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5 南京東路四段 25 號 11 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政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本冊中文版權經由博益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取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by Joseph E. Stiglitz

Copyright © 2002 by Joseph E. Stiglit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Locust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t-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北城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三芝市大智路139號

TEL：(02) 2981 8089 (代客號) FAX：(02) 29883028 29813049

掛號：大塊電腦排版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新南印刷事業行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2年9月

初版二刷：2003年1月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全球化的信託與失落 / 史迪格丹茲  
(Joseph E. Stiglitz) 著；李明譯。--初版。--

臺北市：大塊文化，2002[民 91]

面：公分。--(from: 8)

譯自：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SBN 986-7975-49-9 (平裝)

1. 國際貨幣基金 2. 國際經濟  
3. 國際金融

5521 91014002

目錄

序言 001

總論 013

第一章 全球性機構的承諾 021

第二章 語言成空 147

第三章 選擇的自由 153

第四章 亞洲金融風暴 157

第五章 誰弄丟了俄羅斯

第六章 由不公平的公平交易法談起

第七章 通往市場經濟的更佳途徑

第八章 IMF 的其他方案

第九章 眺望前程

註釋

## 序 言

一九九二年，我離開學術界，到美國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任職。這是我在多年研究與教學工作後，首度進軍政策制定領域，說得更确切一點，是政治的領域。接著我在一九九七年轉到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擔任首席經濟學者 (Chief Economist) 與資深副總裁到二〇〇〇年元月離開，任職期間近三年。我涉足政策制定的時間實在還得很湊巧；任職白宮期間，適逢俄羅斯由共產制度轉型；而任職世銀期間，又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形成乃至席捲全球。

過去我對經濟發展的議題就很有興趣，而這幾年的所見所聞，使我對全球化與經濟發展的看法大為改觀。之所以動筆撰寫本書，是因為任職世銀時，親眼目睹全球化對開

雖說學術生涯並未能為我的華府工作做好萬全準備，但至少讓我具備了充分的專業條件。進入白宮任職前，我的研究與寫作時間分配於兩個領域，一是抽象的数理經濟學（參閱建構所謂的「資訊經濟學」），另一是較為實用的主題，包括公共部門經濟學、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我會經以二十五年的時間撰寫有關破產、公司管理、資訊公開化與可及性的主題（亦即經濟學上所謂的「透明化」），凡此種種，也正是「一九七七年全球金融危機」所面對的重要課題。我對共產主義轉趨為市場經濟，也有將近十年的研究。早在「一九八〇年中國大陸開始往市場經濟前進時，我首度與中國大陸領導人討論到這一問題。自此以後，我大力宣揚中國所採行的漸進式政策，而過去二十年也見證了這些政策的成效。至於某些極端的改革措施，像是在俄羅斯與其他前蘇聯共和國都遭到嚴重挫敗的「震盪治療」（shock therapy），我則一直持嚴格批評的態度。

我與經濟發展問題結緣更早，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我曾在肯亞進行學術研究，當時起一九六三年該國獨立還不久，在當地的島間對我的「一些重要理論著作啓發頗多。我知道肯亞面對的挑戰相當艱鉅，也希望能夠為肯亞以及其他各地像肯亞一樣窮困的人盡一點心力。雖然經濟學者起來像一門枯燥難懂的學科，但事實上，良好的經濟政策足以使中國國家能帶來何等可怕的影響，尤其對於那些國家的窮人更是造成沉重的打擊。我相信全球化能形成一股正面力量，淨除自由貿易的障礙，或使各國經濟整合更為密切，使全世界的人，特別是貧窮的人，都更為富足。不過我也相信，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對進行全球化的方式加以管理，像是在消除貿易障礙上扮演過要角的各項國際貿易協定，還有過去在全球化過程中曾強加於開發中國家之上的諸多政策，都必須微頭微尾地重新思考一番。

出於有過在大學任教的經驗，在七年的華府公職生涯中，我花了不少時間來研究與思索所接觸到的經濟與社會議題。我認為在決定行動方案時，應該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問題，把意識形態拋到一邊，讓證據來說話。不幸的是，我在白宮與世銀任職期間，往往看到決策受意識形態與政治因素主導，以致於許多行動方向錯誤，只為符合當權者的利益，根本無助於解決當前問題，不過這也並不令人意外。法國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撰文提及，為改革而舉止應如像學者，瑣瑣瑣瑣的事實與證據進行科學的討論。可惜的是，實際的情況往往與此背道而馳，學者在參與制定政策建議後反而變得政治化，不惜開始扭曲證據來迎合當權者的想法。

改變那些窮人的生活。我相信政府必須——也能夠——採行有助於國家成長的政策，也要確保成長的果實能更公平地被分享。舉例而言，我贊成民營化（如把政府獨占的事業出售給私人公司），但前提是它能提高效率，並能降低產品售價以造福消費大眾。這種狀況在市場為完全競爭時比較可能實現，而這也是我支持健全競爭政策的原因之一。

無論在白宮或世銀，我所倡導的政策與我之前的經濟學理論研究都有密切的關聯，其中不少涉及市場的不完全性——市場為何不像簡化的模型所假設的那樣——擁有完全的競爭與完全的資訊，因而能完美地運作；我也將自己在資訊經濟學上的研究心得運用到政策制定上，特別是「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理論。這項理論探討資訊在雇主與勞工、銀行與借款人、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差異，能協助建立更切合實際的勞動市場與金融市場的理論，以解釋失業的現象，或是為何最需要錢的人在任借不到錢。歷來經濟學家所採用的標準模型，不是假設市場運作完美——他們甚至否認失業的存在——就是認為工資過高是失業的唯一原因，因此補救之道就是降低工資。資訊經濟學對努力、資本與商品市場有較完整的分析，因此所建構的總體經濟模型對失業問題就能做更深入的分析，對於資本主義固有的景氣循環波動，也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這些理論都有相當強的改革意識，而且相當容易了解——例如要是利率提升到過高的水準，高負債的廠商可能就運轉破產，從而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雖然我認為自己所擬定的政策建議可以讓一人日驟然，但它們卻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常堅持的改革相抵觸。

IMF的政策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有些已經過時，像是「市場藉由本身運作即可獲取有效率的結果」的假設，就忽略了政府干預市場所產生的正面效應，殊不知政府一些引導經濟成長的措施能使每個人都獲益。在以下篇幅中所描述的許多爭論，關鍵核心都在於一些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引伸對政府角色的看法。

這些觀念對於政策建議——有關經濟發展、危機管理、經濟轉型——的形成至為重要，也是我對國際經濟組織擴改革的中心思想。以往對資訊的研究，使我特別關注資訊缺乏的後果，而我也很高興地看到，在一九九七與九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透明化」的重要性一再受到強調。可惜在這種正面發展中還是存有君子們作風，各個國際經濟組織與美國財政部一再向東亞各國強調透明化的重要，但它們本身卻是在公職生涯中所接觸到最不透明的機構。因此在探討國際經濟機構的改革時，我特別強調提高透明度，

讓各界更了解這些機構的作為，也讓受到它們相關政策影響的人在制定政策時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此外，我也以過去實踐經濟學的研究為基礎，衍生出一些對客觀在政治機構中角色的分析。

來到華府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有機會深入了解政府的運作，而且可以實踐過去的一些研究心得。例如，在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時，我所擬定的經濟政策與哲學，將政府與市場視為互補性質，彼此相互合作，雖然市場是經濟的核心，但政府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對市場與政府的運作失靈都做過研究，所以不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有能力彌補所有的市場失靈現象，同樣地，我也不會愚蠢到相信單靠市場本身就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所得分配不平等、失業、污染等種種問題，都有賴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我曾經倡議「政府再造」希望讓政府變得更有效率、反應更快。雖然看過既無效率、反應又慢的政府，但也見過改革是何等艱難，但我還是發現，儘管改革的幅度可能有限，卻並非全然希望。我也帶著這種中庸的觀點以及所學到的教訓到甘肅任職，希望能應用到開發中國家所面臨更艱鉅的問題上。

我很喜歡在柯林頓政府任內的政治辯論過程，其中有勝有負。由於身為總統幕僚，

我不但有總任機會觀察辯論與決策的過程，還能親自參與其中，特別是與經濟相關的領域。我知道理念固然重要，但政治也不容小覷。我的任務之一就是說服其他人，我所主張的非但是好的經濟學，也是好的政治。不過當轉換到國際舞臺時，尤其是在IMF，我卻發現主導政策制定的要素並非政治與經濟。那些機構中的決策基礎相當奇特，複雜了意識形態與經濟學，有時教條之上好像還籠罩著一層特權的外衣。當危機發生時，IMF提出的是過時而不合用的「標準」解決之道，根本不考慮這些措施對執行國家的人民會帶來什麼作用。我很少看到IMF在事前預測究竟自己的政策對發達問題有何影響，或是謹慎地討論分析各項選擇方案的優劣。除了寫「無二」的方案外，IMF對其他不同意見都置若罔聞，完全沒有開放而坦誠的討論空間。無論是有意意識形態主導的政策建議，或是要執行這些政策的國家，只容許遵循IMF的指導原則，沒有什麼爭辯的餘地。

這種態度令我大感不寒而慄。除了經常導致不良的後果外，它還公然違反了民主精神。一般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會不尋求其他建議而盲目遵循某個想法，現在卻居然要求一個國家得這麼做。開發中國家不時會面臨一些棘手問題，在問題惡化為危機時，IMF

F 經常是它們的求助對象。不過 IMF 的補救措施也泰半不能奏效，甚至失敗比成功的還多。IMF 的結構調整政策——協助一個國家因應危機以及調整長期不平衡的政策——在許多國家帶來的反而是飢荒與暴動。就算有時結果不致於這麼糟糕，甚至還能造成短暫的經濟成長，但大部分的利益也落到富人身上，底層的人民卻可能陷入更深重的貧窮之中。

令我驚訝的是，IMF 的許多掌權者與某些關鍵決策負責人對這些政策從不會加以

質疑。經常是由開發中國家的人士提出疑問，但他們害怕喪失了 IMF 的金援，甚至波及其他的籌資管道，因此在質疑時諸多保留，而且並不公開。IMF 內部應將推行方案所

帶來的災難，視為走上市場經濟成功之路必經的陣痛，而且認為可以減輕長期的苦痛。

無疑地，有些苦痛無法避免，不過根據我的判斷，IMF 與其他國際機構所主導的

全球化與經濟發展帶給開發中國家的苦痛，實已遠超過必要的程度。全球化之所以會引

發反對聲浪，並非單純源自於那些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政策對開發中國家造成的嚴重損

害，也是由於全球貿易體系中存在的平等現象。過去不少國家採取虛偽的雙重標準，

一方面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為名，強迫它們對先進工業國家的產品開放市場，但另一方面

卻盡力保護本國市場，不讓開發中國家的產品輸入，結果導致富國愈富而窮國愈窮。至

今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外，已不再有人贊同這種雙重標準。

九一恐怖攻擊事件有力地提醒世人，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形成一個全球

化社會，所以也必須像所有的社會一樣，有一些共同生活所須遵循的規則。這些規則應

該——或至少該看起來——公正不阿，無論貧富貴賤都能受到適度尊重，並且足以反映

基本的尊嚴與社會正義。在今天的世界裡，應該透過民主過程來制定這些規則，相關的

管理機構也必須用心體會世界各地所有身受這些政策影響人民的處境，並回應他們的希

望與需求。

本書依據的是我本身的經驗，雖然其中也夾雜附註與資料來源說明，但並不像一般

學術論文中那麼多。書中有些事件是源自我的親身經歷或耳聞，不過其中並沒有什麼登

入新聞的數字，你不會看到某華爾街或 IMF 重大弊案的證據。我根本不相信有這種

弊案存在，因為真實的狀況更為曲折幽微，決定討論結果的，可能只是聲調上的微妙差

異、一場密室會議、一小紙短簡。許多被批評的人也許會說我曲解事實，可能還提得



來某些重大事件，本書能提供進一步的資訊，而我確信更多資訊必然有助於制定更好的政策，從而獲得更好的成果。果真如此，我也真不無貢獻了。

我希望本書能開啓一項辯論，而且這項辯論不應只發生在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大門內，或是氣氛比較開放的大學裡。所有因全球化管理方式而生活受到影響的人士，都有權參與辯論，而且也有權去究竟是如何制定這類決策的。最有限度，對過去十年

如何受惠於減少貧窮的方案。一頁頁的歷史在此創造，讓我從中獲益良多，本書最是擷取其精華所在。

我訪問過全球數十個國家，拜會了數以千計的政府官員、財政部長、央行總裁、學者專家、經濟發展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人員、銀行家、企業家、學生、政治運動者等等。我到達菲律賓的民答那峨（Mindanao）拜訪回教游擊隊，也從步行經哥馬拉雅山脈，走訪不丹的編譯學校，觀察尼泊爾的農村灌溉方案，我目睹農村貸款計畫對動員孟加拉婦女的成功，也見證中國大陸因山區村

我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國際經濟架構——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管理制度——的改革研議，期使全球化更有效公平，也更為人性化。我訪問過全球數十個國家，拜會了數會瀰漫的問題上，但因為剛好碰上全球金融危機，因此不少時間都花在相關的討論上。

我進入世經服務的初衷，原是想將重心放在經濟發展以及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出反駁我觀點的證據，不過每件事都有許多層面，我只能就自己的所見所聞提出詮釋。

## 謝 辭

本書的寫作會獲得不計其數人士的協助，令我感激不盡。柯林頓總統與世銀總裁理

芬森提供我機會，為自己的國家與開發中世界的人民服務，也使我得以一窺放關全民生

活的決策制定過程，這對學術中人殊為難得。我要感謝世銀數百位工作同仁，我們不僅

在幾年內就本書中的各項議題進行過熱烈的討論，而且他們也不吝將自己多年來的實務

經驗與我分享。他們也協助安排許多旅程，讓我對開發中國家的狀況能取得獨特的觀點。

我擔心特別列出某些名字難免有所疏漏，但另一方面，我還是至少該向那些會與我合作

最密切的人士致謝，包括：Masood Ahmed, Lucie Albert, Amar Bhattacharya, François

Bourignon, Gerard Caprio, Alay Chhibber, Uf Dadaş, Carl Dahman, Bill Easterly,

(Giovanni Ferri, Coralie Gevers, Noemi Giszpenc, Maria Ionata, Roumeen Islam, Anupam Khanna, Lawrence MacDonald, Ngozi Ojomo-Iweala, Guillermo Perry, Boris Pleskovic, Jo Ritzen, Halsey Rogers, Lynn Squire, Vinod Thomas, Maya Tudor, Mike Walton, Shahid Yusuf, Hissan Zaman)。

其他要感謝的世銀人員還包括：Martha Ainsworth, Myrna Alexander, Shaida Badie, Stijn Claessens, Paul Collier, Kemal Dervis, Dennis de Tray, Shanta Devarajan, Ishac Diwan, David Dollar, Mark Dutz, Alan Gelb, Isabel Guerrero, Cheryl Gray, Robert Holzman, Ishrat Husain, Greg Ingram, Manny Jimenez, Mats Karlsson, Danny Kaufman, Ioannis Kessides, Homi Kharas, Art Kray, Sarwar Lateef, Danny Leipziger, Brian Levy, Johannes Linn, Oey Astra Meesook, Jean-Claude Milleron, Pradeep Mitra, Mustapha Nabl, Gobind Nankani, John Nellis, Akbar Noman, Fayed Omar, John Page, Guy Pfeffermann, Ray Rist, Christof Ruch, Jessica Seddon, Marcelo Selowski, Jean Michel Severino, Ibrahim Shihata, Sergio Shmucker, Andres Solimano, Eric Swanson, Marlon Uy, Tara Viswanath, Debbie Weitzel, David Wheeler, Roberto Zagna)。

我也感謝服務於其他國際經濟組織的許多人，我會總與他們討論此處的許多議題——包括 Rubens Ricuperio (UNCTAD), Marc Malloch Brown (UNDP), Enrique Iglesias, Zangy Brizal, Ricardo Hausman (美洲開發銀行), Jacques de Larosiere (歐洲重建開發銀行前總裁)、聯合國的區域性單位以及亞非開發銀行的人員。除了世銀的同仁外，和我互動最頻繁的該算 IMF 人員，雖然由書中的篇章可以看出消楚看出，我對他們的大部分作為以及行事方式，經常有不同意見，但我由他們身上以及與他們的冗長討論中獲益良多，其中包括對他們的心態更為了解。在此我也要聲明：雖然我抱持高度批判的態度，但我理解他們工作的困難，以及國際官方層次的態度，他們其實願意採行更開放的態度，進行更自由的討論。

我也感謝開發中國家許多政府官員們，由中國與印度這樣的大國，到烏干達與玻利維亞這樣的小國，由總理與國家元首到財政部長、央行總裁，到教育部長與其他內閣官員，他們抽空與我討論對國家情勢的看法，以及面臨的問題與挫折。在我們長時間的討論中，他們往往對我推心置腹。雖然有不少人，如捷克前總理克勞斯，對我的言論不表贊同，但我還是從討論中獲益良多。至於像目前受享的首席經濟顧問伊拉里奧諾夫 (S)

在撰寫這樣一本書時，我所倚賴的泰半是自己的經驗，但這些經驗也經過同事與一些新聞工作者的補充。本書中希望能引起一些其鳴的主題是作者的自白取得，許多我所描述的問題之所以會發生，正是由於太多事是隨起門來決定的。我一旦相信，活隨而自由的媒體對權力濫用可以有有效制，而且對民主政治是必要的，我所經常往來的一些記者們並不為此種使命而投入。這裡我又要冒出一種萬的風險，列出其中一些人：Chris Prendergast 對俄羅斯的那章協助頗大，Paul Brinkley 與 Mark Craxi 則對東亞問題提供寶貴的見解。

加拿大國際發展署也提供財務支援。在撰寫期間，福特、麥克阿瑟、洛克斐勒基金會、UNDP、加國政治學雜誌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其目的在於指導我在書中所呼籲的對其他可行方案進行民主的討論 (Keele, 1992)。我深深感謝布魯克斯研究所 (Brooks Institute)、史丹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以及這些單位的學生與同樣，對於本書的相關觀念提供寶貴的討論，也感謝我的助理 Gregor 與我共同成立目前位於哥倫比亞的政策對話計畫 (Policy Dialogue)。我有一段比較能夠照顧委員會的激情歲月後，我有一段比較能夠深思的研究與教學期

身為學界中人，我對造訪的國家有自己的管道因此對事物的看法也能不受制於「官方立場」。本書受惠於這全球學術人士網絡頗多——這是全球化較為健康的一面。我特別感激安丹羅的同事 Gregor，當時是亞太中心的主管，還有目前擔任日本經濟與通產省研究室主管的 Gregor，還有錢耀一，他們不但增進我對亞洲的理解，也為我開啓了多扇門。多年來，好幾位學術同僚與以前的學生也協助我對他們國家的認識，例如韓國的 Yun Young，印度的 Vinod Chandra，馬來西亞的 Yusoff，中國的林毅夫，泰國的 Chaiwatana。

困難，不過我還是要提到荷登 (David Gordon)，他對許多國家鉅細靡遺的描述具有特別的洞見。雖然我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與政府官員討論，我還是會見了許多企業界人士，傾聽他們描述自己面對的挑戰，並對國家狀況提出相關的詮釋。雖然要特別挑出任何個人十分

人士特別要求我不要將他們列入致謝名單，對此我也只能照辦。納威、烏干達總統穆塞尼尼，對於我的言論則大都能接受。有些服務於國際經濟組織的

經濟學是一門選擇的科學。以本書所探討的主題之複雜與有趣，以及其相關學問與資訊之豐富，寫成好幾冊書籍綽綽有餘。這正是我撰寫本書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必須將已寫好的文字刪節為較短的篇幅，而其中不少重要的觀念也不得不割捨。我已習慣於兩種不同的寫作形式：嚴厲的學術性長篇大論以及精簡的通俗講稿。而本書對我而言則屬於另一種嶄新的類型。本書的完成要歸功於席弗林（Zvi Shiff）辛勞的付出，花上好幾個月協助我的寫作與修訂，並做出一些困難的取捨決定。我二十年來的編輯麥克菲里（Michael McPhery）也一直鼓勵並協助我。史都華（Stewart）的編輯相當出色，而韋德（David Wade）則不辭辛勞地將最後的手稿整理出來，還有拉索維茲（Yehonah Levowitz）在好幾個關鍵時刻提供重要的支援。

羅曼尼（Nana Roman）多年來一直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戈多（Sergio Godoy）與雷恩茲（Ziga Renz）盡力核對資料，蒐集我所需要的統計數字。加魯克斯（Jean-François）對初期文稿協助甚多。還有我任史丹福的助理柯爾（Zvi Kolm）與辛（Zvi Shiff）則對修正的文稿出力甚大。

這本書作是以相當龐大的學術著作為基礎，其中有我個人與許多人共同合作的成

果，也有他人的著作，而且也難以一一列舉。我也受更形與全球各地同儕不計其數的討論。這裡應該提及倫敦經濟學院的威德（Zvi Weid）教授，原先曾在世銀任職，他曾撰寫過一些有深度的文章，不僅談到國際經濟組織的一般性問題，也觸及本書的幾個話題，如更亞與衣索比亞。過去十五年來，由共產主義至市場經濟的轉型，是許多經濟學者極感興趣的主題，對此我由 Zvi Kolm 處獲益良多。另外還應提及四位著名的學者 Peter Kuczaj, Ian Steiner, Martin Goldman, Gerard Feind。本書主旨之一就是公開辯論的價值，而我個人由一些昆斯頓與我相左者的討論與著作中學到許多東西——特別是 Richard Layard, Jeff Sachs, Anders Aslund, Andrei Stiner。我也透過與一些轉型經濟學家的討論而獲益良多，包括俄羅斯的 Oleg Bogobolov 與 Zvi Levitsky-Kenshrov。Steve Levits, Peter Eigen, Charles Harvey 則以他們第一手的經驗讓我對波札那有深入的理解，而 Charles Harvey 則對第一章提供詳盡的評論。多年來，與 Zvi Shiff, Patricia Yagupita, Kavi Kanbur, Avi Braverman, Kara Hoff, Raai Sah, David Ravan, Mark Gerovitz, David Newbery, Jim Kirites, Anarya Sen, David Elertson 的共事與討論，對形成的我的思想具有特別的影響力。我要特別感謝 Andy Weis 對轉型問題的務實觀點，對民

## 第一章 全球性機構的承諾

營化後果的實際分析，以及對資本市場不完美的廣泛認知。我稍早與 Martin C 合作為世銀進行的東亞研究，由 Howard Park, Nancy Birdsall, Danny Leipziger, Kevin Murdoch 共同參與，讓我對此一地區有所認識，有助於日後他爆發時我提出處理策略。我特別感謝在白宮與世銀時均和我共事的 Gordon Brown，尤其是他對東亞的看法以及對華盛頓共識的批評。我也要感謝 Martin C 對本書著名的建議。任何本書的讀者都會發現，不完整資訊與市場的觀念所具有的影響力，我相信，這些觀念也是理解市場經濟運作的核心，尤其是開發中的經濟。與 Cal Usgar, Michael Rothfeld, Sandy Grossman, Steve Usgar, Richard White 的合作讓我對失業、資本市場的不完美、競爭的限制、制度的重要性與限制都有進一步的認識。最後，我要提到的是二十五年永遠的合作者與老朋友 Trine Greenwald。

國際官僚機構——世界經濟秩序的無形象徵——目前面臨了處處挨打的局面。原先這些機構的聚會堪稱平靜無波，只不過有一批不起眼的技術官僚討論一些沉悶的議題，像特許貸款與貿易配額等，但現在卻轉變成截然不同的場景，動輒出現街頭暴動以及大規模的抗議。一九九九年 WTO 西雅圖會議，場外出現令人震驚的大規模抗議，自此以後，反全球化運動人士的態度日趨強硬，憤怒的情緒也更為擴散。目前只要是一 IMF、世銀或 WTO 的重大會議，幾乎都免不了衝突與混亂的場面。二〇〇一年熱那亞會議一名抗議者喪生，可能只是反全球化戰爭中更多傷亡的開端而已。

針對全球化組織的政策與行動進行暴動或抗議，可說其來有自。過去幾十年來，開

全球化的另一面——國外援助，發或有其缺失，但也惠及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只是在未受注意。透過世界銀行的計畫，菲律賓海陸軍放下了武器，獲得工作機會，各項灌

受保護的國營企業，但也有助於引進新技術，它拓展新市場、創造新產業。地酪農，但也使窮困的兒童可以喝到便宜許多的牛奶，新設的外國公司或許影響到原本卻也常可看到正面的利益；一九九二年牙買加開放美國牛奶進口，這項措施或許損及當地的公共壓力，也迫使國際社會避免某些貧窮國家的債務。因此說對全球化有負面的影響，二十一國共同簽署，減少兒童與其他無辜者受到地雷傷害的危險。同樣地，透過精心運作動者的串連，特別是運用網際網路通訊，形成了強大壓力，終於得以在一九九七年由一百國際聯盟下的產物。例如原本不少強權國家的政府反對國際地雷條約，透過世界各地行其豐富多樣的程度，就算百年前的營養權貴也望塵莫及。其實反全球化抗議本身也是全球化降低了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孤立感，也使當地人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知識，

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來說，到了廠廠工遠勝過待在農村種田。更好。西方國家人士或許認為附言(之三)在開發中國家雇用廉價勞工是剝削行徑，但對

政廣，讓無數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拜全球化之賜，世界上有許多人命更長，也活得

## 全球化的貢獻

全球化曾帶來過這許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以往許多國家經由國際貿易的帶動，使經濟能夠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亞洲不少地區採行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產業

全球化帶來過這許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以往許多國家經由國際貿易

的帶動，使經濟能夠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亞洲不少地區採行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產業

全球化帶來過這許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以往許多國家經由國際貿易

的帶動，使經濟能夠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亞洲不少地區採行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產業

全球化帶來過這許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以往許多國家經由國際貿易

的帶動，使經濟能夠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亞洲不少地區採行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產業

全球化帶來過這許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以往許多國家經由國際貿易

的帶動，使經濟能夠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成長。亞洲不少地區採行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產業

批評全球化的人指責西方國家偽善，其實並非無的放矢。因為這些國家一方面極力縮增長的速度為前所未有，而中國則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減少貧窮。俄羅斯貧毛額（GDP）僅及俄羅斯的六〇%，而十年之後，這項數字剛好翻轉過來。俄羅斯與中國大陸自行主導的經濟改革，形成了極端鮮明的對照。一九九〇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僅及俄羅斯的六〇%，而十年之後，這項數字剛好翻轉過來。俄羅斯與中國在比當年共產領導人所預言的還來得慢。由國際經濟機構所規畫的俄羅斯轉型，相較於案，但結果竟是非前所未有貧窮。對大多數人民而言，市場經濟有許多方面的表現，甚至帶來原先承諾的結果。西方世界曾信誓旦旦，宣稱這種新經濟制度會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俄羅斯與其他由共產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言，全球化與市場經濟並沒有年的某段期間，亞洲金融風暴的確有席捲至世界經濟之勢。

會急延全球，任何新興市場貨幣的崩潰將拖累其他貨幣。事實上，一九九七與一九九八年洲的危機，使得所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與穩定都備受衝擊。目前不少人擔心，金融問題如果說全球化在減少貧窮上不算成功，那麼在確保穩定上亦復如此。亞洲與拉丁美引了民間投資，因此經濟成長也無法持久。

棄了社會主義，力圖建立清廉政府，也努力維持預算平衡並抑制通貨膨脹，可是就是吸

今卻出現反轉趨勢。雖然發燒在診愛滋病肆虐，但貧窮也是殺手之一。有些非洲國家放中，國民所得與生活水平都呈下降。過去幾十年好不容易節節提升的國民平均壽命，以非洲國家而言，脫離殖民統治時的美好憧憬大都未能實現，反而陷入更深的苦難。該所得年平均成長率有一、五%，但全球貧窮人口卻增加了約一億人<sup>②</sup>。生活費。雖然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我們不斷聽到減少貧窮的保證，而且同一期間，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第三世界陷於赤貧的人口增加，他們一天只有不到一美元的

## 未實現的承諾

話的經濟利益。

問題，就必須接受全球化。但對不少身處開發中世界的人而言，全球化並未帶來原先承為全球化（通常指接受美式資本主義）就是進步，開發中國家追求成長或有效解決貧窮

貶抑全球化的人經常忽略它好的一面，但倡言全球化的人態度則更為偏頗，他們認為方案協助抑制了這種致命疾病的蔓延。於方案協助抑制了這種致命疾病的蔓延。於方案協助抑制了這種致命疾病的蔓延。於方案協助抑制了這種致命疾病的蔓延。



## 不平衡的觀點

這算不把西方國家認為偽君子，它們在過去推動全球化方案時，的確比較重視確保自己能獲取大部分的利益，而犧牲開發中國家。工業先進國一面拒絕對開發中國家的商品開放市場，諸如對紡織品到糖類等多樣產品設定進口配額，一面卻堅持對方該為它們的商品敞開大門。此外，工業先進國持續補貼本國農業，使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難以競爭，但卻要求對方取消對工業產品的補貼。更有甚者，試看一九九五年第八次貿易協定簽訂後的「貿易條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產品的相對價格，就可以發現它的淨效果是讓一些最貧窮國家出口品相對於進口品的價格降低，也就是使得這些國家變得更貧窮。

拉丁美洲與亞洲放寬資本市場管制，雖然使西方銀行獲利，但這些區域本身卻大

量匯入的熱錢（在瞬間流入與流出一國的金錢，多係看好該國貨幣將升值或貶值而進行投機）在短期間快速流出而受害，必須收拾劇烈的幣價與惡化的金融體系。烏拉圭回合談判（Uruguay Round）強化了智慧財產權，因此西方各大藥廠可以名正言順地阻止印度和巴西「竊取」它們的智慧財產，但此舉讓這些開發中國家的人無法再以西方藥廠售價幾分之一（的低價，買到本地藥廠所生產的救命藥品。因此烏拉圭回合的決策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西方製藥公司獲利會增加，論者認為這樣可以激勵創新研發；但問題是，因為開發中國家沒有多少人買得起這些藥品，銷售利潤增加了多少，因此所謂激勵效果也可能相當有限。另一方面，成千上萬開發中國家的患者付不起高昂的價格，可能因而喪命。雖然在愛滋病藥品的案例中，藥商屈服於強大的國際反理，在一九九〇年底同意以成本價銷售，但潛在的問題仍未解決，因為根據烏拉圭回合談判而建立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立場不盡平衡，絕大部分是反映生產者的權益與觀點，而對使用者——無論在已